

德国核威慑争论:背景、焦点及影响

周 顺

[内容摘要] 长久以来,德国关于核威慑的争论一直被视为“幽灵辩论”。德国对美国“延伸威慑”的提议或法—德欧洲威慑力量的设想皆反应寥寥。21世纪后,美俄战略核力量的改造升级、2014年乌克兰危机导致的欧洲地缘政治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威胁从欧洲撤出核保护伞等系列因素,为德国2016年以来的核威慑争论创造了条件。争论的焦点是,假设德国与欧洲丧失美国核保护伞,要如何进行安全保障。这种全面、公开、持续的争论及媒体报道在德国尤为罕见,争论形式本身即在德国引发了“政治地震”。多种“核选择”被纳入讨论之中,包括泛欧洲威慑或欧洲威慑、德国本土核威慑,以及保持德国核潜能。该争论是德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建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突破核禁忌、为拥核“试水”的一次重要尝试。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德国核威慑之争出现了新的动向,或对未来欧洲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 德国 核威慑 核争论 核潜能 俄乌战争

[作者简介] 周顺,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2022年的俄乌冲突几乎重塑了德国的核威慑理念与立场。战争打响的第四天,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讲话。讲话指出,战争严重威胁现有的欧洲安全秩序,德国必须加大国防投入,建立一支更高效、现代、技术领先的联邦国防军,保护德国的自由民主,阻止战争蔓延至其他国家。德国不仅要投资1000亿欧元设立联邦国防军“特别基金”、每年将GDP的2%以上资金用于军费开支、与法国合作开发建造下一代欧洲战斗机及坦克,更重要的是,德

国宣称将“毫无保留地恪守北约的同盟义务,没有任何限制与条件”。^①尤其是在北约“核共享”问题上,德国将购买 36 架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A 闪电 II 战斗机,替换国内部分老化的“旋风”轰炸机,^②危机发生时该战斗机将携带储存在德国比谢尔空军基地的美国 B61 战术核弹头并投放至指定目标。这一讲话打破了德国 70 多年来的政治禁忌,被认为是“德国战略的新定位”“欧洲沉睡巨人的苏醒”“第六个德国的诞生”。^③

然而德国核威慑观念的转变并非朝夕之间。德国特殊的核道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尤其是 2016 年以来德国政策界的新一轮核威慑争论,为此次德国安全战略的全面转型奠定了重要基础。总的来说,2016 年以来德国的核争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即北约“核共享”机制能否突破、如何建设欧洲核威慑力量、德国独立核威慑及保持核武器制造潜能的可行性。尽管德国政府以购买可携带核武器的战斗机作为对俄乌冲突的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为核争论划上了句号;相反,它标志着德国核威慑争论新阶段的开始。因此,了解 2016 年以来的德国核争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国战略转型的动力、方式及未来走向。

一、德国的核困境及新一轮核争论的背景

二战后,联邦德国在核武器问题上表现出极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出于历史记忆,德国坚持一贯的核军控立场;另一方面,出于现实安全需求,德国保留了自己使用核武器的可能,在北约“核共享”与欧洲核威慑之间左顾右盼。这种矛盾的“核心态”源于德国长久以来对自身特殊道路的不断探索与重新定位。军事及道义上的失败严重影响了德国对自己国际角色的认知。从 20 世纪上半叶对

① Olaf Scholz,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 Olaf Scholz am 27. Februar 2022,”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regierungserklaerung-von-bundeskanzler-olaf-scholz-am-27-februar-2022-2008356>.

② “Germany to Buy US-made F-35s Capable of Carrying Nuclear Weapons,”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3/15/germany-to-buy-us-made-f-35s-capable-of-carrying-nuclear-weapons>.

③ Sudha David-Wilp and Thomas Kleine-Brockhoff, “A New Germany: How Putin’s Aggression Is Changing Berlin,”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germany/2022-03-01/new-germany>; Noah Barkin, “Europe’s Sleeping Giant Awakens,”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22/03/germany-putin-ukraine-invasion/623322/>.

权力的迷恋到 20 世纪下半叶对权力的遗忘,德国在外交事务中极力保持谦虚、克制和低调,在欧洲和跨大西洋关系中维持多边主义,同时推进德美、德法重要双边关系,以期重新获取国际社会信任,应对苏联、俄罗斯的威胁。^① 美苏、美俄关系以及欧苏、欧俄关系亦是德国考虑核问题的重要因素。

(一) 参与北约“核共享”的困境

从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反军国主义、放弃权力政治到冷战后德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重返世界舞台,该国的核政策“总是不断在两根不同的弦上弹奏”:坚决放弃核武器的同时又急欲参与核发展的进程。一方面,联邦德国以放弃本土制造核武器为条件,谋求在北约的核参与。联邦德国置身于美苏冷战对峙的最前沿,一旦美苏开战,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将是双方核攻击的首要目标。1954 年北约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以对抗苏联的计划,这对联邦德国来说是忧喜参半。通过重新武装的方式制度性地融入西方,有利于提高联邦德国在北约的地位;而重新武装又必将使邻国产生威胁之感。为此,阿登纳总理主动提出联邦德国放弃本土制造核生化武器,但对于获得核设施以及从他国获得核武器等问题则讳莫如深,为德国日后重新参与核进程预留了空间:1957 年,联邦德国接受法国邀请参与核武器研制;1969 年联邦德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署中增添附加条件,即其可以继承未来欧洲联邦(盟)中任一成员国的核武器,美国也对此予以承认;^②同年联邦德国与日本就拥核问题展开讨论;^③1990 年签署有关两德统一的《二加四条约》时,联邦德国再次重申统一后的德国无核的“有条件性”。

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参与核进程以扩大自身对北约核决策的影响。^④据 1955 年北约核演习的估算,一旦联邦德国遭到苏联核攻击,将至少导致 500 万人伤亡,这还不包括放射性污染的危害。该结果更加坚定了联邦德国在北约使用核武器问题上拥有决策权的决心。联邦德国首先从核武器发射工具上对美国与北约的

^① Ruth Wittlinger, e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11.

^② [德]卡尔-海因英·坎普:《德国的核政策与欧洲核合作》,《现代国际关系》1994 年第 10 期,第 41 页。

^③ 于青:《日本曾与联邦德国讨论拥核》,《人民日报》2010 年 12 月 1 日,第 21 版。

^④ 王海涛:《德国北约政策研究 1990~2020》,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21 年,第 38 页。

核决策进行制约。1957年联邦德国引进核发射载具并与美国形成“两把钥匙机制”，即美国若不同意使用弹头，联邦德国就无法发射；反之，联邦德国若不发射，美国的弹头也无法打出去。^①通过这一机制，联邦德国至少部分实现了对北约战术核武器使用的控制权。但该机制显然不能满足联邦德国对北约战略核武器决策权分享的要求。1960年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以及该计划在1966年之后的替代机制——北约核规划小组均为联邦德国参与北约核决策提供了机会。即便如此，联邦德国在核决策中的话语权依然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1977年苏联在欧洲部署的SS-20中程核导弹打破了欧洲核均势，在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呼吁下，美苏重启谈判。但美国与北约提出的对策并未充分顾及联邦德国的利益，而是一边与苏联就限制中程核导弹进行谈判，一边不顾联邦德国反对，在欧洲部署中程弹道潘兴II。这一“双重决议”使得1987年美苏在签署的《中导条约》中仅对中程导弹核力量进行限制，而未像联邦德国极力要求的那样将短程核导弹纳入裁汰之列。联邦德国不禁哀叹道，“射程越短，对德国人来说越是致命”。^②

（二）德法核合作的困境

对德国而言，美国与北约的“核保护伞”虽不可信，但作为“经济巨人核侏儒”的德国与“经济侏儒核巨人”的法国能否实现力量互补并真正领导欧洲亦是个未知数。因此，德国一方面不愿在核力量上着墨太多，不愿在保证公众知情的前提下就核威慑问题进行务实辩论；另一方面对于法国提出的法德欧洲核威慑设想，始终反应平平。罗伯特·卡根曾总结德国这一矛盾心态：“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他们并不完全确定曾经被称为‘德国问题’的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法国人仍然不相信他们可以信任德国人，而德国人也仍然不相信他们可以信任自己。”^③在许多学者看来，虽然德国拥有欧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经济体量，

^① 吴友法、叶晓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德国核武装问题探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675～676页。

^② [德]卡尔·海因英·坎普：《德国的核政策与欧洲核合作》，《现代国际关系》1994年第10期，第44页。

^③ Robert Kagan, "Power and Weakness: Why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ee the World Differently," *Policy Review*, No. 113, June 1, 2002,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3460246.html>.

但真正主导德国的却是“当代小国的意识形态”,这种和平主义、拒绝军事成长、激进反核的心态使其无法认识到自己在新秩序中的核心地位,德国对自身力量不承认、不正视的态度被欧洲邻国批评为“非常自私,因为她对别国的成本和利益视而不见”。^①批评者甚至认为,德国在核问题上再次陷入了“令人羡慕的困境”:如果德国的核主张与其结构性力量相称,它就会被诅咒;如果德国在核问题上保持冷漠,它也会被诅咒。^②

德国的这一核困境导致了以下局面:历届政府都宣称联邦国防军非核武化,但该国的核争论始终若隐若现。这些争论或时间过短,或未引起足够关注,未对历届政府的非核化立场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也被称为“幽灵辩论”。1949年北约成立后,联邦德国一直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之中。1960年代早期,阿登纳总理对美国“核保护伞”的可靠性提出质疑,在向法国总统戴高乐提出将联邦德国纳入法国核打击力量的建议被拒后,联邦德国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及此后的《二加四条约》。^③在国际条约的双重枷锁下,无论是1976年以来美国“延伸威慑”各类备选方案的提议,还是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于1995年提出、希拉克总统于2006年再次重申的“协同威慑”概念,都只引起了德国部分人士的关注,无法在全国引发持续性的核争论。^④2007年,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邀请德国有限参与法国的核武库,以德国为法国核力量出资的方式换取发言权。德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正如当时的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指出的那样,德国没有拥核的愿望。^⑤该看法代表了当时核争论的主流声音。

(三) 欧洲安全环境新变化

德国的核立场始终受美俄关系、美德关系、欧俄关系所影响。乌克兰危机以

^① Andrei S. Markovits and Simon Reich, *The German Predicament: Memory and Power in the New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5.

^② Ruth Wittlinger, ed.,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4.

^③ David Swanson, “Get the Nuclear Weapons Out of Germany,” <https://www.pressenza.com/2021/01/get-the-nuclear-weapons-out-of-germany/>.

^④ Julia Berghofer, “An Offer Postponed: Berlin’s Silence on Macron’s Deterrence Thinking,” <https://www.europeanleadershipnetwork.org/commentary/an-offer-postponed-berlins-silence-on-macrons-deterrence-thinking/>.

^⑤ Anne Balzer, “Europe’s Nuclear Boomerang,” <https://www.ips-journal.eu/regions/europe/europes-nuclear-boomerang-4094/>.

来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变化、特朗普时期美欧关系的迅速恶化以及美俄战略核力量的改造竞争为德国新一轮核争论的展开提供了契机。一方面,2014 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出现了新对抗。德国对于俄罗斯的侵略性感到极大不安与惶恐。在危机应对中,德国扮演了欧洲领导角色,对俄态度随着危机演进愈发强硬,甚至不惜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率领欧盟其他国家制裁俄罗斯。有学者甚至提出,乌克兰危机可能是德俄关于欧洲未来权力争夺战的一次预演。^① 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欧洲政策的反复无常大大降低了欧洲对美国持续提供核保护伞的信心。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即主张美国对欧洲安全的承诺应附加条件。德国各派政治精英担心,特朗普可能会背着欧洲与俄罗斯达成某些大交易,并迈出华盛顿和莫斯科主导欧洲未来的第一步。^② 伦敦国王学院的德裔教授马克西米利安·特哈勒在《外交政策》撰文表示,如果德国选择以发展核武器的方式应对危机,那么首先应该指责的是美国拒绝提供核保护伞而非俄罗斯的侵略。^③ 此外,美国与俄罗斯对各自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改造升级也加大了德国对核威胁的感知。美国不断提高核生产能力,通过重力核试验,验证低当量核弹头,开发新核弹头用于实战,改造 F-35 战机以携带战术核武器;俄罗斯则全面升级战略核武器投射工具(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雪松”等)与核武器发射平台(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等),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在核威慑力量中的运用。欧洲的多重危机使德国政治家意识到,德国必须“在一个充满危机和动荡的世界里”,承担起领导欧盟的新角色。德国总统阿希姆·高克在 2014 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上呼吁:德国需要做出更大贡献以延续几十年来他国为自己提供的安全保障,特别是要调整步调以应对新的威胁和国际秩序结构的变化。^④

在此背景下,德国展开了新一轮核威慑争论。第一次争论发生在特朗普当

① 郑春荣、朱金锋:《从乌克兰危机看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同济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第 40~41 页。

② Max Fisher, “Fearing U. S. Withdrawal, Europe Considers Its Own Nuclear Deterren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06/world/europe/european-union-nuclear-weapons.html>.

③ Maximilian Terhalle, “If Germany Goes Nuclear, Blame Trump Before Put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4/03/if-germany-goes-nuclear-blame-trump/>.

④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 7.

选美国总统之初(2016年末至2017年初),集中讨论了美国扩大核威慑的可信度,以及德国是否应该在美国削减其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探索各种政策选择;2018年7月特朗普在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及赫尔辛基举办的美俄峰会上威胁退出北约后,德国爆发了第二次核争论。与第一次争论一样,主要讨论了美国退出北约后,德国和欧洲将面临的安全局势问题。不同的是,第二次争论已从德国是否应该寻求“核共享”之外的其他核选择这一根本问题转移开去,更专注讨论替代方案实现的具体途径,其中法德的欧洲核威慑方案获得较大重视。^①有评论认为,德国此轮的核争论如同一群无视历史教训的冒失牛仔聚众喧哗。但事实上,这场争论远比该看法复杂和关键得多,德国的核争论并非“放纵的幻想”,而是因应欧洲安全环境新变化的一种尝试。^②

二、2016年至2022年初德国核威慑争论焦点

2016年末至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之前,德国核威慑争论主要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核共享”的评估

“核共享”是冷战的特殊产物,由于时空环境变化,“核共享”之于德国的政治意义已逐步淡化。2010年北约“战略新概念”重新凝聚了欧洲共识。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全力支持北约“核共享”安排,反对联合国推动《禁止核武器条约》。2016年德国《安全政策白皮书》指出,北约(尤其是美国)的战略核能力是成员安全的最终保证。^③2018年德国表示,只要核武在北约战略概念中发挥威慑作用,德国即参与北约核战略讨论和规划进程。^④在新一轮的核争

^① Ulrich Kühn et al., “Tracking the German Nuclear Debate,”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7/09/07/tracking-german-nuclear-debate-pub-72884>.

^② Maximilian Terhalle, “If Germany Goes Nuclear, Blame Trump Before Putin,”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4/03/if-germany-goes-nuclear-blame-trump/>.

^③ “White Paper on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Bundeswehr 2016,” p. 65, <https://www.bundeswehr.de/resource/blob/4800140/fe103a80d8576b2cd7a135a5a8a86dde/download-white-paper-2016-data.pdf>.

^④ Peter Rudolf, “Deutschland, die Nato und die nukleare Abschreckung,”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0S11/>.

论中,德国关于核共享问题的立场分成三大阵营。讨论主要聚焦于三点:部署于德国境内的核武器,其相关军事用途和风险是什么?德国参与“核共享”会对北约核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德国拒绝“核共享”中的操作性核部署方案,是否会对北约凝聚力产生影响?^①

阵营一,“核共享”赞成派,包括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及另类选择党等人士。在他们看来,储存于德国的美国核武不仅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也具有实际的安全效用。“核共享”不仅使德国在核决策中拥有强有力的发言权,间接影响美国的核决策,也给予了德国在北约内部继续为支持军控发声的机会。支持者指出,如果德国退出“核共享”,或者要求美国从德国撤除核武器,仅保留参与核规划小组框架内的讨论和协商的功能,那么其他盟国将不得不在北约内部承担德国的份额和风险,从而威胁到德国自身安全,^②毕竟美国的核威慑是欧洲唯一可信的安全保障。^③

阵营二,“核共享”反对派,包括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他们认为,“核共享”是冷战时期构想的延续,具有根本性缺陷,危及当今世界和平。“核共享”并非安全保障,相反,它是“最高的不安全保障”。首先,美国的“延伸威慑”尤其强调要拥有广泛的可分级和灵活使用的核选择,即有发动“有限核战争”的能力。而德国则将核武器视为“政治威慑武器”,侧重于最低限度的威慑与有保障的报复能力,核战争不过是一种“遥远的假设”。^④其次,德国高估了自身在北约核态势与美国核决策中的影响力。冲突发生时,核规划小组的主要作用是将美国单方面的核决策通报盟友,并获得盟友的认可。德国可以拒绝用飞机投掷核弹,但并不能劝阻美国总统使用核武器。^⑤最后,参与“核共享”令德国陷入道德与法律困

① Amelia Morgan and Anna Péczeli, eds., “Europe’s Evolving Deterrence Discourse,” pp. 34 ~ 37, https://cgsr.llnl.gov/content/assets/docs/CGSR_euro_det_final.pdf.

② Claudia Major, “Germany’s Dangerous Nuclear Sleepwalking,”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europe/75351>.

③ Michael Rühle, “Daydream Believers,” <http://berlinpolicyjournal.com/daydream-believers/>.

④ Rolf Mützenich, “Nukleare Teilhabe – überholtes Konzept ohne Funktion,” https://shop.welttrends.de/sites/default/files/public_downloads/WeltTrends-167-M%C3%BCtzenich.pdf.

⑤ Peter Rudolf, “Deutschland, die Nato und die nukleare Abschreckung,” <https://www.swp-berlin.org/10.18449/2020S11/>.

境。“核共享”协议不符合德国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也不符合其宣称的倡导国际军控的相关政策。^①

阵营三,“核共享”折中派,包括社民党和部分绿党人士。折中派主张,德国需要某种形式的威慑力量,“核共享”可信度虽然存疑,但德国单方面退出该机制可能招致更大的危险。首先,德国不能忽视美国核保护伞在抵御俄罗斯核讹诈方面的重要性,只有美国有能力抵挡俄罗斯的核力量。其次,储存在德国的核武器缺乏战略效用。“延伸威慑”的困境在于,美国核决策时如何权衡拥核国的利益与无核国的利益。对拥核国而言,首要的安全利益是防止战略反击;而对于德国这样的“前线国家”而言,首要利益是避免在本国领土上进行核打击。^②在折中派看来,德国首先使用核武并不实际,以核武威慑或虚张声势则缺乏可信度。最后,对“核共享”的支持主要取决于核威慑和核裁军之间的关系。德国单方面退出“核共享”无助于核武器数量的减少,正如外交部长、社民党人海科·马斯多次声称的那样,德国可能因此失去影响北约核裁军政策的能力。^③

(二)“核共享”之外的选择

德国是否应该以及如何在美国削减安全保障的情况下探索“核共享”之外的各种选择?支持者认为,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张凸显了欧洲核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德国需要重新考虑自身及欧洲的核态势。2018年初,德国外长西格马·加布里尔呼吁,“如果不建设欧洲核力量,欧洲就会成为肉食动物世界中的最后一个政治素食主义者,”最终沦为异国“猎物”。^④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分析师乌尔里克·弗兰克也表示:对德国和欧洲来说,进行一场战略辩论来探寻“核共享”之外

^① Dieter Dettke, “Returning to the Past to Win the Future: The SPD in Search of a Long-Term Strategy,” <https://www.aicgs.org/2020/05/returning-to-the-past-to-win-the-future-the-spd-in-search-of-a-long-term-strategy/>.

^② Wolfgang Richter, “Erneuerung der nuklearen Abschreckung,”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erneuerung-der-nuklearen-abschreckung>.

^③ Amelia Morgan and Anna Péczeli, eds., “Europe’s Evolving Deterrence Discourse,” https://cgsr.lnl.gov/content/assets/docs/CGSR_euro_det_final.pdf.

^④ Céline Jurgensen, “Europe, France and Nuclear Deterrence,” http://www.geographie.ens.fr/IMG/pdf/europe_france_and_nuclear_deterrence_-jurgensen.pdf, p. 9.

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德国需要面向未来,并重新认识欧洲安全体系的总体结构。^①反对者则指出,关于德国与欧洲“核选择”问题的辩论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僵尸辩论”。德国与欧洲拥核的理由在安全、战略自主、民主善政等方面均存在严重缺陷。这些“僵尸理由”之所以不断重新浮出水面,是因为欧洲核概念的反转及德国相关利益集团推动的结果。^②换言之,讨论德国“核选择”的目的是对民众进行“核教育”。^③

表 1 德国的核选项

	费用	风险	可行性	可信度	争议性
北约“核共享”	低一中	低一中	高	高	不变
欧洲威慑	高	中	低一中	低	变少
德国拥核	非常高	非常高	非常低	非常低	变多
保持核潜能	高	高	低	高	变多

图表来源:笔者根据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 19 中的表格增订而成。

德国“核选择”的争论更多来自部分专家学者与媒体人士的看法。目前来看,欧洲大陆共有四类核立场:一是像英法这样的拥核国;二是受“核共享”保护的北约国家,其中比、德、意、荷、土五国存有美国核弹;三是反核并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欧盟国家,如奥地利、爱尔兰、马耳他;四是保持中间立场,即与北约建立强有力伙伴关系的同时暂缓签署《禁止核武器条约》,如芬兰、瑞典、瑞士等。^④汉堡大学乌尔里希·库恩等学者对 2016 年 10 月后德国国内的核辩论进行了追踪,辩论认为德国较有可能的“核选择”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泛欧洲威慑

① David Swanson, “Get the Nuclear Weapons Out of Germany,” <https://www.pressenza.com/2021/01/get-the-nuclear-weapons-out-of-germany/>.

② Kjølsv Egeland et al., “European Nuclear Weapons? Zombie Debates and Nuclear Realities,” *European Security*, Vol. 30, No. 2, 2021, p. 250.

③ Ibid.

④ Emmanuelle Maitre, “Nuclear Deterrence in Europe: Points of Convergence, Singularities and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https://www.frstrategie.org/en/publications/recherches-et-documents/nuclear-deterrence-europe-points-convergence-singularities-and-prospects-cooperation-2021>.

或欧洲威慑,二是德国部署本土核力量,三是保持德国制造核武器潜在的核技术能力(见表1)。^①

就欧洲威慑而言,德国可能要考虑在英法基础上发展欧洲核保护伞。基民盟的国防专家罗德里克·基斯韦特表示,德国可以向法国提供资金共同建设欧洲的核力量,^②以补充北约“核共享”失效后的核真空。基斯韦特指出,法—德欧洲核威慑立基于四大要素:法国承诺将核武器用于欧洲共同防御;德国为法国核力量建设提供资金;建立联合指挥部;确立在其他欧洲国家安置法国核弹头的方案。^③ 2017年联邦议院研究部门的评估报告也表明,德国出资建设法国核力量以换取法国核力量的欧洲化,这并不违背德国国际义务。^④

尽管法—德欧洲核威慑是德国核争论中关注度较高的选项,但法国是否真的能够为德国提供延伸威慑有待检验。首先,法国面临“法核欧洲化”与“欧洲核不扩散”之间的困境。法国核武库的欧洲化设想并没有获得邻国的积极回应。在奥地利、爱尔兰等国加入2015年的“人道主义倡议”及2017年开始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后,法国的核力量欧洲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⑤ 其次,法国对核力量保持排他性控制。法国的核武器一直被理解为主权和战略自主的象征。一旦法国核力量欧洲化,就必须使用类似北约的核共享安排。这与法国核独立决策机制相左。最后,法国核学说可能阻碍欧洲核威慑力量的建设。法国核学说没有升级控制,只有“最终警告”,即只向对手发出一次性核警告,并以“刚好够用”的核力量给对手“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法国核力量无法与俄罗斯核武库

①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 19.

② Andrea Shalal, “German Lawmaker Says Europe Must Consider Own Nuclear Deterrence Plan,”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k-germany-usa-nuclear-idUSKBN13B1GO>.

③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 14.

④ Deutscher Bundestag, “Völkerrechtliche Verpflichtungen Deutschlands beim Umgang mit Kernwaffen: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Ko-Finanzierung ausländischer Nuklearwaffenpotentiale,” <http://www.bundestag.de/blob/513080/c9a903735d5ea334181c2f946d2c8a2/wd-2-013-17-pdf-data.pdf>.

⑤ Audrey Quintin, “Nuclear Weapons and Deterrence: the Case of Europe,” <https://globalriskinsights.com/2020/12/nuclear-weapons-and-deterrence-the-case-of-europe/>.

相比,也无其他实际能力来兑现其“延伸威慑”的承诺。^①

(三) 德国拥核之争

德国的另一个核选择是考虑独立拥核,或至少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潜能。2018年7月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冯·克里斯蒂安·哈克在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星期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中向全体德国人发问:“我们需要原子弹吗?”他指出,德国弃核的条约义务、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都应该根据新的发展条件重新审查。一方面是各国利益差异太大,另一方面是法国核决策无法真正与德国共享。^② 鉴于大西洋两岸新的不确定因素和潜在对抗风险,德国必须要消除核武器禁忌,考虑德国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为一个核大国,以保障自身和联盟的安全。^③ 尽管该文章应者寥寥,但依然赢得了像马克西米利安·特哈勒等政治学家的支持。早在2017年初,特哈勒就曾表示,特朗普政府的亲俄政策将动摇德国安全政策的核心战略基础。为了国家和欧洲的安全,柏林迫切需要投资建立一个可靠的核威慑力量,无论是等待美国对欧政策进一步明朗或依靠英法核威慑欧洲化,都是不明智的选择。^④

拥核派中的一部分折中主义者则认为,德国拥核是在“欧洲—大西洋安全保障完全崩溃情况下的最后选择”,^⑤更重要的应该是“保持其制造核武器的潜在能力”,即核潜能。2016年11月《法兰克福周日报》出版商伯托尔德·科勒撰文指出,德国人应当做好接受“不可思议之事”的准备,如果德国要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赢得先机,就需证明自己有能力保护盟友,增加国防开支及建设本土核威慑,

①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p. 16 ~ 17.

② Matthew Karnitschnig, “German Bomb Debate Goes Nuclear,”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german-bomb-debate-goes-nuclear-nato-donald-trump-defense-spending/>.

③ Von Christian Hacke, “Eine Nuklearmacht Deutschland stärkt die Sicherheit des Westens,” <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schland/plus180136274/Eine-Nuklearmacht-Deutschland-staerkt-die-Sicherheit-des-Westens.html>.

④ Maximilian Terhalle, “Deutschland braucht Atomwaffen,” <https://causa.tagesspiegel.de/politik/europa-und-die-weltweitenkrisen/deutschland-braucht-atomwaffen.html>; Maximilian Terhalle, “If Germany Goes Nuclear, Blame Trump Before Putin,”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4/03/if-germany-goes-nuclearblame-trump/>.

⑤ Thorsten Benner, “Germany’s Necessary Nuclear Debate,” <http://www.gppi.net/publications/peace-security/article/germanys-necessary-nuclear-debate/>.

维持核潜能乃必经之路。^① 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创始人托尔斯滕·本纳呼吁,德国应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措施下,通过构建一种公开的对冲能力来提高自身的核武器潜能,通过核潜能的“虚张声势”影响美俄决策以维持现状。^② 事实上,德国一直保持着制造核武器的潜在技术。20世纪70年代德国就曾作为非核武国家开发生产并运行了整个核循环技术,其核出口为巴西、伊朗的核电站、核浓缩、燃料生成和铀分离提供相关技术,直接或间接促成南非、巴基斯坦、朝鲜和伊朗拥核。^③

德国公开拥核的论调旋即招致大量批评。反核人士认为,“德国拥核论”根植于冷战时期威慑力量的概念,并不令人信服。首先,德国独立核威慑不具备三大现实条件。^④ 一是德国受国际条约义务约束。一旦德国拥核可能导致其他国家效仿,德国或将成为“国际核不扩散制度的掘墓人”。^⑤ 二是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核武器扩散。反核似乎成了一项德国传统,除另类选择党公开支持拥核外,其他政党和公众几乎是压倒性的反对。三是德国已废弃核设施,要恢复耗时较长,需要将格罗瑙铀浓缩厂国有化,或取用慕尼黑工业大学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研究反应堆的高浓缩铀来进行。^⑥ 其次,德国独立核威慑也因缺乏战略部署而显得空洞无力。一方面,拥核者并未说明德国将如何安排核力量来保护德国与欧洲利益。以不对称的核力量阻止俄罗斯核讹诈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德国不仅需要部署足够的核弹头储备,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核指挥系统。另一方面,支持拥核者没有将德国的核威慑扩展延伸至其他非核的北约国家的具体计划。特哈勒主

① Von Berthold Kohler, “Das ganz und gar Udenkbare,”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von-trump-zu-biden/nach-donald-trump-sieg-deutschland-muss-aussenpolitik-aendern-14547858.html>.

② Tristan A. Volpe, “Atomic Leverage: Compellence with Nuclear Latency,” *Security Studies*, Vol. 26, No. 3, 2017, pp. 517 ~ 544.

③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 12.

④ Rafael Loss, “The Folly of a German Bomb,” <https://thebulletin.org/2017/06/the-foley-of-a-german-bomb/>.

⑤ Von Wolfgang Ischinger, “Ein atomares Deutschland wäre verhängnisvoll,” <https://www.welt.de/debatte/kommentare/plus180159046/Nato-Ein-atomares-Deutschland-waere-ein-Verhaengnis.html>.

⑥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 11.

张,核武器是德国保护东欧邻国独立不受侵害的唯一途径,但如何以核力量保卫它们尚不明确。在缺乏公认的延伸威慑机制的前提下,这些国家可能还未因俄罗斯的威胁和衷共济,就已经因德国的核扩散而同室操戈了。^①

德国公开拥核虽是一种较为边缘的观点,但释放出的早期预警信号却是十分重要。基斯韦特作为前联邦国防军总参谋官、前联邦议院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小组委员会主席以及外交事务委员会现任发言人能公开提出这样的观点,足以引起警惕。^②用特哈勒的话来说,德国独立核威慑争论的真正目的是对美国政府的一种警示,以提醒他们放弃北约核保护伞的严重后果。^③无论是法—德欧洲核威慑或者德国独立拥核,任何一种“核选择”都有可能引发欧洲“政治地震”并造成连锁反应。

三、德国核威慑争论的新动向

德国国内掀起新一轮核威慑争论之际,欧洲安全局势亦发生重大变化。2021年12月朔尔茨新政府颁布执政协议,对此轮核威慑争论做出回应。但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美、俄、欧多个国际政治行为体竞相展示核力量,欧洲再次真实地直面核威胁。德国新政府的核计划设想被急转直下的战争局势打破,德国国内的核威慑争论之声再起。尚无法确定目前最新的核威慑争论是前述争论的延续亦或是新一轮争论的开启,但此次核威慑争论必将对未来欧洲乃至世界核力量发展及核裁军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一) 联合政府执政协议对俄乌冲突之前核威慑争论的回应

2022年俄乌冲突之前的核威慑争论,是德国一贯谨慎的“核立场”与引领未来欧洲防务新责任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对德国而言,孤立或对抗都不是一个欧

①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p. 10 ~ 12.

② Ulrich Kühn, “The Sudden German Nuke Flirtation,”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6/12/06/sudden-german-uke-flirtation-pub-66366>.

③ Tristan Volpe and Ulrich Kühn, “Germany’s Nuclear Education: Why a Few Elites Are Testing a Taboo,”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40, No. 3, 2019, pp. 10 ~ 12.

洲核心国应有的政策选择。相反,明确自身在欧洲核安全问题上的责任,承担相应的“核义务”,在核危机中扮演领导者与协调人的角色(正如德国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问题上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那样),^①或许才是核威慑争论想释放的信息。德国的各类“核选择”方案是其构建欧洲新安全架构的一次“试水”,也是为全体德国人应对“新的威胁与国际秩序变化”而开展的一项“核教育”工程。

德国核争论不断发酵之际,全球在核威慑问题上的两极分化态势日益严重。一方面,民间社会组织的“禁核”呼声势头正劲,2021年初《禁止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50余国加入这一条约。^②另一方面,各大拥核国也正在加紧推进核力量的改造升级:2020年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了法国的欧洲核威慑新设想,邀请欧洲伙伴国进行战略对话及联合核演习,以培育共同的核战略文化;2021年3月英国在《综合评估》报告中宣布将取消核弹头数量的上限;俄罗斯计划增加核开支以实现核武库的现代化;北约在2022年6月的马德里峰会上推出“新战略概念”以应对“俄罗斯在欧洲的挑战”,重申“只要核武器存在,北约就将继续是一个核联盟”;拜登政府将美国核武目的限制在威慑或报复核攻击之上,类似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③

2021年底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后,面临的是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国际核环境。与前总理默克尔16年来一贯的“核共享”立场不同,新政府的核立场更为复杂。首先,从竞选纲领来看,联合政府致力于“保持可信的核威慑潜能”。自民党是唯一明确支持“核共享”的政党,虽说支持“全球零核”的长期目标,但也反对德国采取任何违背北约安全战略的单边行动;社民党与绿党则将“无核德国”作为政策目标。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罗尔夫·穆策尼奇公开反对“核共享”,温和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以避免伤及跨大西洋关系;绿党中激进的“基金会派”以反对一切核事务闻名,中间派亦支持德国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

① Frank-Walter Steinmeier, “Germany’s New Global Role: Berlin Steps Up,”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4, 2016, pp. 106 ~ 113.

② Abe Nobuyasu, “NPT-TPNW Standoff: Who Can Break This Gridlock?” <https://www.apln.network/projects/wmd-project/npt-tpnw-standoff-who-can-break-this-gridlock>.

③ Ronja Ganster, “Germany’s New Government Settles the Nuclear Debate – for Now,” <https://www.gmfus.org/news/germanys-new-government-settles-nuclear-debate-now>.

2022年6月德国以观察员国名义参加了在维也纳奥地利中心举行的缔约国第一次会议,并对核裁军进程未有进展表示关切。^①

其次,从联合执政协议来看,新政府对德国未来在北约“核共享”中的角色有着更严密的规划:第一,德国不会采取戏剧性的单边措施(例如主动退出“核共享”),而是支持美俄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之后的协议展开双边会谈,并考虑将核军控的具体安排整合进俄罗斯的“新安全方程式”中。第二,执政协议没有提及欧洲军队,而是将北约“核共享”定位为“德国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础”。有观点认为,这或许表明德国即便赞同欧洲战略自主,也并不一定乐于接受法国联合核演习的邀约。社民党新任联合主席克林贝尔表示,在核威慑问题上加强德法合作是一件“危险而荒谬”的事情。第三,执政协议中关于核威慑与核裁军的措辞较为折中。专家预计,德国未来与《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接触可能只是出于某种政治交易的需要,以换取社民党和绿党在“旋风”轰炸机更替方案上的支持。只要北约仍然是一个核联盟,德国就不会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第四,执政协议呼吁发起“裁军政策攻势”,让德国继续在“加强国际裁军倡议和不扩散机制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以表明对“斯德哥尔摩倡议”与“不扩散与裁军倡议”的支持。此外,还将继续遵守伊朗核协定,就新兴非核破坏性技术对战略稳定的影响进行对话。^②

(二)核威慑争论的最新发展

朔尔茨政府的核计划设想被急转直下的俄乌战争局势打破,欧洲核风险遭遇“历史性回归”。俄罗斯公开发出核警告、提升战略核力量的警戒水平,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威胁在飞地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中短程核导弹,甚至进行“末日飞机”集体升空的展示,均向北约表达了俄罗斯不惜核战的决心。

对德国而言,回答欧洲与德国是否需要核武器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① “First Meeting of States Parties to the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aussenpolitik/themen/tpnw-wien/2538098>.

^② Hanna Notte, “Berlin Continues to Look to Moscow and Washington for Major Strides in Nuclear Arms Control,”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berlin-continues-to-look-to-moscow-and-washington/>.

为迫切。^① 德国扩大核威慑力量或许并非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最佳方式,但仍需适当地做好最必要的核准备。^② 就应对燃眉之急而言,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萨沙·哈赫与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的玛伦·维勒夫等提出一项权宜之计,即以模糊与灵活的“降级”模式对抗俄罗斯不断“升级”的做法。执意比拼或刺激俄罗斯的核力量,并由此扩大德、欧与北约的“核共享”武库,显然不是俄乌冲突的正解;相反,维持现有核力量、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放弃与俄罗斯的核较量,或许可以为应对俄罗斯核威胁开辟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并为潜在的核攻击做好应对准备。^③ 简言之,即以“示弱”的方式处理俄乌冲突引发的欧洲核威胁。

就长期的核政策调整而言,更多人士开始主张欧洲核战略自主。欧洲议会基督教民主党领导人曼弗雷德·韦伯指出,俄乌战争使欧洲认识到,将欧洲防务掌握在自己手中是迫在眉睫的大事。考虑到美国未来会更多地将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德法两国现在就应该提请欧盟理事会处理欧洲核威慑问题。^④ 德国政治学家赫尔弗里德·明克勒则认为,鉴于俄罗斯的核威胁不断升级,欧洲应该积极回应2020年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核威慑对话的建议,在美国与北约之外进行欧洲核力量建设。^⑤ 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欧盟危机研究专家埃克哈德·吕布克梅尔也支持柏林与巴黎之间展开对话,因为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毕竟不根植于欧洲本身。^⑥ 基民盟领导人默茨则进一步指出,世界局势的发展使得

① Ulrich Reitz, “Keine Angst vor Kernwaffen: Warum Deutschland jetzt über atomare Aufrüstung sprechen muss,” https://www.focus.de/politik/ausland/ukraine-krise/keine-angst-vor-kernwaffen-warum-deutschland-jetzt-ueber-atomare-aufruestung-sprechen-muss_id_65436312.html.

② Sascha Hach und Maren Vieluf, “Mut zur Deeskalation – Warum nukleare Abschreckung Gift ist und nicht Gegengift sein kann,” <https://blog.prif.org/2022/05/04/mut-zur-deeskalation-warum-nukleare-abschreckung-gift-ist-und-nicht-gegengift-sein-kann/>.

③ Caroline Fehl, Maren Vieluf and Sascha Hach, “A Stress Test For Nuclear Deterrence,” <https://www.ip-snews.net/2022/08/stress-test-nuclear-deterrence/>.

④ Ulrich Reitz, “Keine Angst vor Kernwaffen: Warum Deutschland jetzt über atomare Aufrüstung sprechen muss,” https://www.focus.de/politik/ausland/ukraine-krise/keine-angst-vor-kernwaffen-warum-deutschland-jetzt-ueber-atomare-aufruestung-sprechen-muss_id_65436312.html.

⑤ “Politologe Münkler für, nukleare Option der Europäer – unabhängig von den USA,” <https://www.rnd.de/politik/ukraine-krieg-atomwaffen-in-eu-politologe-herfried-muenkler-fuer-optionen-OY43CODX35DJXBUII5WT3CZDM.html>.

⑥ Von Lea Verstl, “Russische Raketen bedrohen EU: Braucht Europa die eigene nukleare Abschreckung?” <https://www.n-tv.de/politik/Braucht-Europa-die-eigene-nukleare-Abschreckung-article23444688.html>.

德国必须支持马克龙关于加强欧洲核威慑能力的提议。“我们谁也不知道 2024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也不知道核保护的承诺是否依然有效”。自主的核能力是欧洲人民的“生命保险”,这一话题不应该再有禁忌。默茨主张德国要为建立欧洲核力量创造条件,他提议联邦议院就此问题展开讨论。^① 联邦议院基民盟/基社盟议会党团副主席托尔斯滕·弗赖对此表示支持,他认为欧洲应准备好“思考不可想象之事”,“法国核力量的欧洲化”是保护欧洲利益的唯一途径。^②

但也有部分人士强调,德国应加强核能力建设,为北约核威慑力量做出贡献。基社盟议员亚历山大·多布林特指出,有效的外交政策需要核威慑护航,德国提供投掷核武器载具等做法是正确的选择,德国应该对北约“核共享”做出明确承诺。^③ 基斯韦特的表态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他认识到仅仅依靠法国建设欧洲核威慑力量略显单薄,不足以慑止俄罗斯对欧洲的攻击。因此他在支持法国核力量欧洲化的同时,希望法国能够像美国那样通过“核共享”的形式给予盟友以发言权。基斯韦特还提议将欧洲核保护伞的建设与对俄会谈联系在一起,这种做法似乎在效仿当年北约与苏联的“双重决定”,即一手建设欧洲核力量,一手与俄罗斯磋商核裁军。^④ 另一方面,基斯韦特主张法德合作以及欧洲核保护伞的扩大不能也不应该取代美国对欧洲的“延伸”保护,前者应扮演好美国核威慑“补充者”的角色,并避免给人留下德国不愿意与美国分享核决策的印象。^⑤

(三)朔尔茨政府的回应及影响

对于朔尔茨政府而言,德国核威慑争论的现实意义在于如何解决眼下俄乌冲突给德国与欧洲造成的安全威胁。德国政府明确表示,德国不能在俄乌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置身事外。德国外长、绿党主席贝尔伯克指出,就核问题而

① “CDU-Chef Merz - Europa muss Atommacht werden,” <https://www.tagesspiegel.de/politik/nukleare-kapazitaet-ist-unsere-lebensversicherung-cdu-chef-merz-europa-muss-atommacht-werden/28400280.html>.

② Von Lea Verstl, “Russische Raketen bedrohen EU: Braucht Europa die eigene nukleare Abschreckung,” <https://www.n-tv.de/politik/Braucht-Europa-die-eigene-nukleare-Abschreckung-article23444688.html>.

③ “CSU: Bundeswehr muss wieder zu Abschreckung beitragen können,” <https://www.boerse.de/nachrichten/CSU-Bundeswehr-muss-wieder-zu-Abschreckung-beitragen-koennen/33971276>.

④ “Frankreich will über europäische nukleare Abschreckung sprechen,” <https://www.deutsches-wochenblatt.de/Frankreich-will-ueber-europaeische-nukleare-Abschreckung-sprechen-137679.html>.

⑤ Ibid.

言,绝不能要求西方盟友单方面核裁军。^① 因此,当朔尔茨政府决定增加 1000 亿欧元的国防费用,部分用来增购可以携带核弹的 F-35 战机时,不仅没有遭到社民党的反对,甚至得到绿党的全力支持。就连国际废核运动德国董事会成员霍尔的观点——俄乌冲突再一次让欧洲站到了核悬崖边,为避免危机进一步发展,德国必须裁军而非购买核武器的发射平台^②——在民众中也不再占据主流,这是二战以来德国在核立场上前所未有的转变。德国以采购 F-35 战机的实际行动,提升了北约的核能力,巩固了北约的团结,促进了欧洲核武器的纵向扩散。^③

德国与北约的核态势或将加剧未来欧洲的核对峙以及更广泛的全球核紧张态势。首先,作为对北约核态势的回应,俄罗斯宣布暂时退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设施核查机制。2022 年 8 月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寻求“创造单边优势”,剥夺俄罗斯“在美国领土进行核查的权利”,俄罗斯“被迫”将俄方设施从《条约》所规定的核查活动中撤出。^④ 引发了全世界对美俄唯一核军控协定之命运的担忧。其次,日本试图效法德国,谋求“核共享”。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希望与美国加强合作,实现美日核武器共享。此后自民党等开始讨论在日本部署与联合使用美国核武器的相关内容,日本拥核问题甚嚣尘上。最后,朝鲜也正在加速研发战术核武器。上述因素的叠加导致 2022 年 8 月在纽约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举步维艰,全球核对峙局面日益严峻。

结 语

长久以来,德国关于核威慑的争论一直被视为“幽灵辩论”。尽管看法各有

① “Baerbock stößt Debatte über neue Sicherheitsstrategie für Deutschland an,” <https://www.wiwo.de/politik/deutschland/ukrain-krieg-baerbock-stoesst-debatte-ueber-neue-sicherheitsstrategie-fuer-deutschland-an/28177938.html>.

② “F35 nicht für die nukleare Teilhabe verwenden,” <https://www.icanw.de/neuigkeiten/f35-nicht-fuer-die-nukleare-teilhabe-verwenden/>.

③ 核武器的横向扩散指核武器扩散到多国、多地区;核武器的纵向扩散指核武器系统的升级与现代化。

④ “Russia Paused New START Inspections Ahead of US Plan to Conduct such Probe in Days,” <https://tass.com/politics/1491611>.

不同,但都是“茶壶里的风暴”,对政策的实质影响并不大。德国对美国“延伸威慑”方案的提议或法—德欧洲威慑力量的设想也反应寥寥。21 世纪以来,美俄战略核力量的改造升级、2014 年乌克兰危机导致的欧洲地缘政治变化,以及特朗普政府威胁从欧洲撤出核保护伞等系列因素,为德国展开新一轮核威慑争论创造了条件。这种全面、公开、持续的争论及媒体报道在德国尤为罕见。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普格莱林的话来说,争论形式本身就已令人叹为观止,足以引发一场德国的“政治地震”。^①或许,争论的意义并不在于真正找到某一核保障方案替代现有的北约“核共享”机制。核威慑争论的重要之处在于,在强调威慑与裁军并重的同时,加强德国核防御能力、增进欧洲核防御合作,以期在冲突水平间建立分界线,防止战略核杀戮的发生。^②

德国核威慑争论对北约核态势产生重要影响。欧洲安全长期依赖美国与北约的核威慑。核威慑争论使德国开始重新思考自主核威慑问题,这不仅是对欧洲地缘政治变化的回应,也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北约作为核联盟之于欧洲的意义。俄乌冲突表明,北约已经不再具有冷战时代的决定性地位。^③当俄罗斯警告北约不得在乌克兰领空设立禁飞区,否则视其为直接参与对俄作战时,北约不敢越雷池一步。北约之于欧洲安全重要性的下降,意味着德国拥有核武器或将是增强欧洲战略自主的选项之一。

德国核威慑争论客观上加强了北约的战略团结。德国近年来关于核威慑的持续争论令北约颇感不安,担心德国关于战略自主的考量会影响北约团结、减损欧洲应对俄罗斯核威胁的能力。^④2022 年 6 月北约峰会“新战略概念”对“北约作为核联盟”的强调,不仅回应了俄乌战争局势,也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德国核威慑争论。瑞典与芬兰新近申请加入北约说明北约核力量对于保障欧洲与大西洋安

① Max Fisher, “Fearing U. S. Withdrawal, Europe Considers Its Own Nuclear Deterren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3/06/world/europe/european-union-nuclear-weapons.html>.

② Stephen F. Szabo, “Should Germany Go Nuclear?” <https://www.aicgs.org/2018/08/should-germany-go-nuclear/>.

③ “Kissinger: Russia’s Victory in Ukraine Will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NATO,” <https://sachkhabrain.com/en/world/kissinger-russias-victory-in-ukraine-will-shake-the-foundations-of-nato/>.

④ Constanze Stelzenmüller, “Nuclear Weapons Debate in Germany Touches a Raw NATO Nerve,” <https://www.ft.com/content/837aa9a9-b546-4b5f-983a-0c70c50bb768>.

全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①朔尔茨政府决定采购可携带核武器的 F-35 战机以增进北约“核共享”的做法正是出于安抚北约、改善德美关系的目的,这从客观上加强了北约的战略团结。

德国核威慑争论有利于增进欧盟的战略自主。核威慑争论使德国与欧洲意识到,民事力量不足以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共同推进“软实力”(民事力量)与“硬实力”(军事力量)才是欧洲实现战略自主的王道。2022 年 3 月的《凡尔赛宣言》指出欧洲需增加防务费用以提升军事实力。^②德国亦通过购买包括核武器运输平台与发射工具在内的装备扩大军费开支。这一方面提升了北约“欧洲支柱”的实力,增加了欧洲在北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为未来欧洲核发展培养了核作战人力与技能,从而间接增强了欧洲的战略自主能力。待条件成熟,德国在北约中的核技能可能直接转化为欧洲的核技能。朔尔茨政府增加核作战能力的做法,或将真正带领德国与欧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核威慑争论对于德国未来的安全政策亦影响深远。核威慑争论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核禁忌”,预示着德国承担欧洲安全与防务重担的决心。一方面,德国正在考虑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使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更加步调一致。另一方面,德国也将重塑国家安全战略的知识生态系统,或进一步推进“德国和平研究基金会”的建设工作,通过支持高水平的国防和战略研究,更好地对德国在战略新定位之后的规划、原则和能力做出评估。^③在可预见的未来,核威慑或将持续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议题之一。

①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p. 1, p. 8.

② “Informal Meeting of the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Versailles Declaration,”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54773/20220311-versailles-declaration-en.pdf>, p. 3.

③ Rafael Loss, “Germany’s Need for an Integrated Deterrence Mindset,” <https://ip-quarterly.com/en/germanys-need-integrated-deterrence-mindset>.